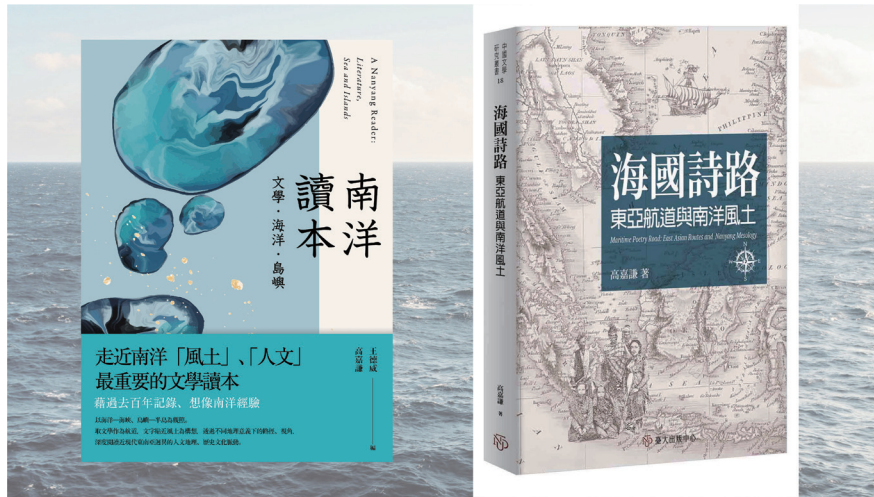


海國詩路與南洋風土

時 間：113 年 12 月 6 日（五）15:30-17:30
地 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誠大樓 B1 會議室
主 講 人：高嘉謙（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主 持 人：張瓊惠（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與 談 人：徐國能（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教授）
記 錄：國立中正大學人文沙龍團隊

一、他從海上來：馬來海域的華夷交會

主講人高嘉謙老師首先說明，此次講題的構想源自兩本書的編輯與寫作，其一是與王德威院士合編的《南洋讀本》，主要選錄當代華文文學，以海洋、島嶼為視角出發，試圖從一個古已有之的移入、遷徙和跨洋路徑，思考島與島、海與陸、內地與外延、邊界與跨越的各種可能，透過文學切入社會、歷史。其二是他在 2024 年底出版的專書《海國詩路：東亞航道與南洋風土》，這本書以十八世紀以降的海域視野為起點，試圖將航路上的文字素材和線索做整體性的觀照與論述。書中以「海國詩路」為軸心，研究範圍涵蓋東亞航路北端的琉球，到馬六甲海峽周邊的新加坡、檳城和棉蘭，以及爪哇海周邊的印尼群島，透過分析漢詩、竹枝詞、粵謳、日記等多元文類，探究東亞航線與南海，尤其馬來群島周邊的風土建構，以及殖民城市景觀與社會生活。本講座主要聚焦於三項子題，其一是說明海國與詩路的指涉對象與方法論思考；其二是由島嶼世界與華夷風土的論辨，呈現傳統華夷世界觀的在地實踐與轉化，兼述及華人於當地風土、民族、族群的觀察與日常生活音聲；最後則由南洋使節的漢文詩作探究地緣政治及新馬華文文學最初的情感格局。事實上高老師本身就是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新住民」，正是基於這樣的背景，他得以從一個獨特的視角，循著過往商賈、文士、使臣從東亞到南洋航道上的影跡，串聯海洋、島嶼、社群、風土等諸多面向，提供來自域外、海上的文學新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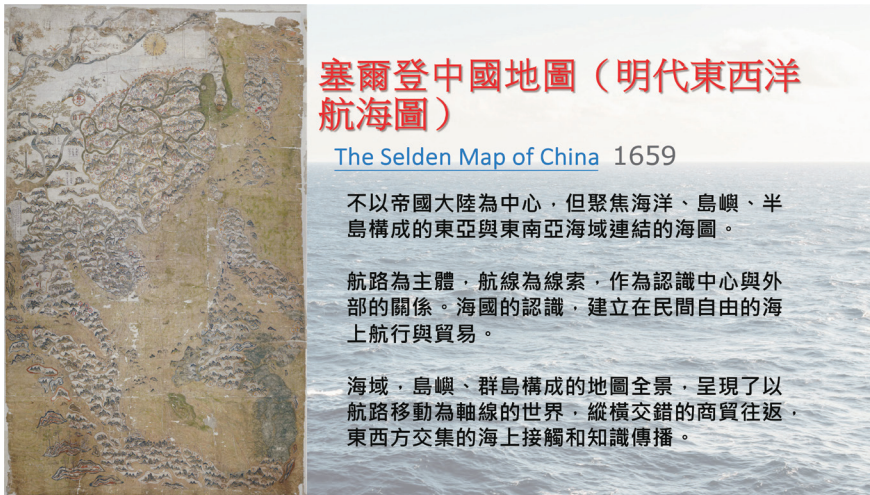


圖一：(左)王德威院士與高嘉謙老師合編的《南洋讀本》；(右)高嘉謙老師出版專書《海國詩路：東亞航道與南洋風土》(圖源：講者簡報)

二、海國與詩路：海洋、島嶼、詩歌的鏈結

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於1659年開始典藏《塞爾登地圖》(Selden Map, 或稱《明代東西洋航海圖》),但塵封三百餘年無人聞問,直至近年重新為學界所「發現」,引發熱烈討論。這幅地圖與以帝國大陸為中心的傳統地圖不同,它聚焦於東亞與東南亞海域,包括海洋、半島和島嶼,並以中文標記地名、針路(航海導航指示)、羅盤子午線。據推測,這幅地圖應是往來或定居於東亞與東南亞海域的唐人海商所繪製,後輾轉自商人或殖民者取得。該圖以航路為主體,航線為線索,將我們的視角從陸地轉移到海洋,呈現了一個以航路移動為軸線的世界。透過這幅地圖,我們可以看到,航海不僅促進了貿易往來,更連接了不同地區的文化。這些航路串聯起海岸、內陸和島嶼,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海上網絡,促使知識、文化在不同地區之間流動。這些航路也見證了東南亞島國聚落的形成、港埠的商貿聚集、海島帝國的崛起等,串聯起眾多島嶼,形成了文化、社會與歷史交匯點。航行於此的旅人,無形中也成為這片海域及「海國」視野的一部分。

「海國」一詞原指四面環海之島國,或海岸線特別綿長的國家,但在明清以降的歷史語境裡,其核心內涵常被認知為中原陸地以外,透過跨海出境由海域連接的異地各國,或存在於海域和海域之間的島國支點。如明末張燮(1573-1640)所著《東西洋考》將南海東部及鄰近諸島稱為東洋,反之則為西洋。其雖未嘗親履各地,卻藉由博徵群書,詳述海上諸國地理、氣候、名勝、物產、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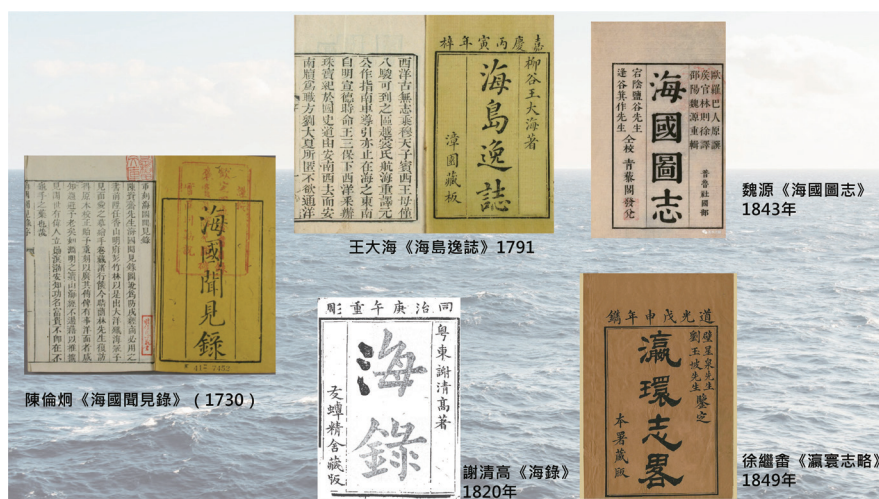


圖二：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於 1659 年開始典藏《塞爾登地圖》（Selden Map，或稱《明代東西洋航海圖》）（圖源：講者簡報）

文等項目，形成航線為主的知識網絡，形塑域外海國基本印象之追索。海國知識的建立，引導著一種對外部世界的慾望、外交想像與布局。但明代中葉因東南沿海倭寇襲擾，實施海禁，清帝國初期也因與明鄭勢力對峙，延續海禁政策，爾後雖逐漸開邊展界，允許民間從事海上貿易，但直至十九世紀後期才恢復正式官方出洋。然而，十五至十七世紀，歐洲各國展開的「大航海時代」改變了南海世界的地緣政治，十八、十九世紀其殖民勢力已在大陸及島嶼東南亞盤據扎根。透過港埠與都市的建設，作為統治機構和裝置的近代國家逐漸在殖民帝國貿易時代成形。此時清帝國之海國遊歷與探知，意味著對於海域秩序與知識的重置，其中有使臣、商賈、文士的詩歌寫作描繪了南方海域與風土，各地華人僑領與官方領事也在外交前線，以詩歌回應海國視野的地理形塑及現實處境。

主講人高老師強調，傳統漢詩在中國及海外漢字文化圈內，一向被視為是營造知識、情感鏈結、投射史觀的基礎，為了更精準探索這些在東亞航路和南海地區產生的詩歌，他使用「詩路」這個概念，將其定義為：在東亞航路和南海的歷史背景下，因遷徙、移居和行旅，伴隨文化接觸與生活感受而產生的詩文創作。這些詩文不僅記錄了地理知識與風土視野，更反映了背後所蘊含的文學脈動及世界觀。「詩路」也關照文學如何表徵海洋、陸地、群體的交織連結，詩在社群、社會、風土的互動生成，以及島嶼、港埠、殖民地之間關係性的開展。在東亞航路與南海世界裡的漢語文獻，如何鋪展移動帶來的視野轉換、知

識建構、生存體驗，印證海上貿易、外交行旅中最鮮明的文化衝突及價值觀碰撞，面對域外新奇事物的接觸與吸收，政治與外交在地緣意義下的重整，這是高老師關注海洋與詩路的起點及方法論思考。綜言之，詩歌與航路的交織，反映了晚清時期複雜的地緣政治格局。海國與詩路所形塑的知識型態，圍繞著晚清使臣、文人出洋與遊歷、海商長時異地「住番」的見聞，從海洋與航線的框架中展開人們對於所感知環境的思考與認識，也透露出地緣政治的交會及共振。



圖三：十八、十九世紀以降各類海上遊記、筆記對南海以南世界多有著墨
(圖源：講者簡報)

三、異鄉何必不中華：島嶼視界與華夷風土

季風推動船帆，締結了海國與群島的交織網絡。風作為古時海上行旅的推力，既是自然環境的氣流運動，也承載著豐富的文化意涵，如風勢、風氣、風潮和風土。高老師認為，從自然義延伸至社會義時，風即從自然的作用力引申到社會的影響力，與「風氣」、「風土」緊緊相扣的社會概念是「風俗」。楊儒賓、和辻哲郎(1889-1960)以及邊留久(Augustin Berque)等學者曾深入研究「風俗」的概念，強調人與環境、文化、自然間有著交互作用和中介關係，亦即環境並非純然的客體。與此同時，漢語寫作的詩歌、筆記、日記等紀錄，描述和鋪陳了海國的文明與風土，也反映了華人文化在海外的傳播與發展。這些與異文化的相遇，也意味著傳統華夷世界觀的在地實踐與轉化。「華夷思想」是先秦以降，構成天下秩序及王朝合法性的根據，呈現出「內中國／外夷狄」和「中心／

邊緣」的空間意識，亦涉及政治、外交、文化等層面的差序格局。華夷世界觀的核心觀念是貴華賤夷與華夷之辨，內化為一套注重文明程度與文化差異的表述邏輯，不過華夏與夷狄諸族的區別，主要是風俗文化的差別，而非地域之別，兩者也存在相互影響及交融變化的可能。而明清鼎革、漢滿政權轉移構成「華夷變態」，也揭示華夷秩序觀的裂變與轉化，東亞使節訪華也產生微妙的華夷視域變化，如越南、朝鮮使節都曾有視本國為「小中華」、滿清為「腥羶之地」的見解。

在南海航路、南島生活脈絡下，高老師探討文人如何透過文字建構異地地方感，以及如何運用修辭手法，去捕捉、表達並傳遞南島風土面貌。他以王大海《海島逸誌》為例，其於乾隆年間隨商船泛海至爪哇島，輾轉居住馬來半島各地，入贅於華人甲必丹擔任塾師（甲必丹即荷蘭語「kapitein」的福建話音譯，乃首領之意，指稱當地僑領），在爪哇居住近十年，衣食無憂，僕役成群，最終以家有老母而返回故鄉。《海島逸誌》在民族風土、自然地理、物產人情及奇譚怪事，風尚習俗都有細緻又別具趣味的紀錄。王大海對於華人遷徙與落地生根的現象、島嶼異族習性的諸多描繪，表現其地方性寫作的觀察特點，也含括華夷風土觀的建立和轉換。他也觀察到，華人移民的跨境遷徙，促使其方言與當地語言相互交融，形成了新的方言書寫體系。這種語言的交流與融合，豐富了當地文化，也塑造了獨特的風土形貌。

在十九世紀末之下南洋群體中，廣府人是新加坡第二大方言群。航路上遷徙的嶺南沿海方言群，帶動粵語民間文學的遷移，其中「粵謳」此說唱文體是重要的境外寫作範例。1881年，新馬兩地第一份華文報刊《叻報》創立，1906年開始刊載粵謳，隔年加編附頁增加刊載數量。粵謳是一種粵語諧趣文體，偏重吟唱型態，著重口語表述，其突出的「聲音」，可看作廣大移民群體的生存「聲音」。粵謳的風景重心，不在擬真地呈現外部現實，而是在筆下文字與聲音腔調之間，製造一個活力的湧動與往返，那是下南洋的苦力貿易與異地移居脈絡裡，一種涉入情色、感官、身體、勞動所相互交織的「生活」樂趣，進入到知識與勞動移民群體的生活，遊走於鴉片、賭博、嫖妓、政治、經濟等生活的脈絡和思維。比起漢詩的酬唱，粵謳更貼近於一種可居的處境，恰恰是離散華人生活其間的一幅風景，可看、可聽，並且感受。其內容也以教化意義的勸誡與嘲諷為主，批評華人社會陋習。但在看似八股的教條式概念中，這些詩歌往往關注社會底層的生活，對妓女等弱勢群體的遭遇抱以同情，呈現甚少在漢詩內發現的華工與移民市井世界，也是一種有聲的底層生活。

四、海角天涯寄此身：使節漢詩的情感象徵意義

講座最後的焦點放在南海航路上的使節漢詩。十八、十九世紀，當中國使節與海商走向南海航路時，朝貢貿易體系已為西方殖民勢力東漸而瓦解，荷蘭及英國建立的東印度公司貿易體系與殖民地管理秩序，也重新形塑中國人的南洋視野。使節有過境者，亦有長期派駐者，他們漢詩的寫作視野，有別於遊歷歐美遭逢文明、制度、器物等物質與世界觀的衝擊。這些使節的詩作往往涉及南島原始風土的判讀，以及身處殖民地港埠的複雜境遇，不僅表達了對異域風情的感知，更將個人的情感與外交使命緊密結合，體現地緣政治意義的歷史感，以及個人情感的困頓無奈，展現出客愁、客感。例如派駐到新加坡的第一任領事左秉隆（1850-1924）在詩中經常以「客」自居，凸顯其身處外邦的無家感，從廣義來看，這樣的情感結構恰巧指向移民群體的飄零、流離、神傷的生命體驗。身處南洋邊陲的使節身分，又要應對異域的複雜局勢，內心充滿不確定與憂患意識，混雜著難以施展的抱負，是一種生活於夾縫中的無力感，遂於詩作中化為犬儒式的自嘲。高老師認為，使節們的漢詩不僅反映了他們對異域風土的觀察與感受，更深層地揭示了在南海地緣政治背景下，華人知識分子所面臨的複雜心境。這些詩作中所呈現的「客愁」，不僅是對故鄉的思念，更是對傳統「天朝上國」觀念的反思。使節們在南洋所見所聞，使其對華夷之辨產生了新的理解，其「客愁」也為後來的新馬華文文學奠定了情感基礎。



圖四：主講人高嘉謙老師（右）以獨特的視角，串聯海洋、島嶼、社群、風土等諸多面向，提供來自域外、海上的文學新思路；與談人徐國能老師（左）從不同角度詮釋主講人的觀點，豐富學術討論；主持人張瓊惠老師（中）總結全場，為本場講座劃下完美句點

不論海國或詩路，或者在航道上不同的族群音聲，都指向了外部世界，風土則是架構了這個外部世界可供理解、對比與介入的管道。海洋視野下的華文文學討論，結合了行旅與移民史的脈絡，使這些產生於境外和航道上的作品帶來不同的文學樣貌，特別是不同環境與人的互動，使境外文學的構成變得較為複雜，亦加增了離散文學的向度。可以說，航路的往返、人們的遷移與文化的播遷及交融，為新馬華文文學的誕生奠定了基礎。